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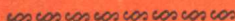
南开史学

一九八六年 第一期

南开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



要 目



洋务派创办的吉林机器制造局.....	张万鑫
论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对耶稣会士的政策.....	林延清
关于国外的拜占廷学.....	陈志强
军阀研究.....	戴纳·拉莉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史学 (半年刊)

一九八六年 第一期

编辑：南开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

报刊号(津)第115号

出版：南开大学出版社
地址：天津八里台 电话33,1602-434
印刷：南开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总发行：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
零售、订阅：各地新华书店、
南开大学出版社邮购部

定价：1.00元

目 录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天津伪政权的控制

……………陈志远 乔多福 (1)

略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张洪祥 高德福 李成民 (12)

黎段府院之争初探……………潘 荣 (33)

洋务派创办的吉林机器制造局……………张万鑫 (53)

论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耶稣会士的政策……………林延清 (79)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重本抑末”政策……………杨家友 (93)

宜兴岳庙和岳飞在宜兴……………高洪钧 (106)

关于国外的拜占廷学……………陈志强 (115)

评三十年代的英国对德政策……………林和坤 (126)

龚帕斯与威尔逊政府的内外政策……………陆镜生 (144)

军阀研究……………戴纳·拉莉著 李恩民译 关文斌校 (169)

三位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迈纳克

布洛赫和卡博德……………约翰·海厄姆等著

孔庆山 译 (196)

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侯杰 (220)

新书《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出版…………… (114)

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对天津伪政权的控制

陈志远 乔多福

抗日战争时期的天津伪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和奴役天津人民的工具，是日本侵略者“以华制华”政策的产物。本文拟就天津伪政权的建立过程和日本对其政治上的控制，揭示天津伪政权的反动本质。

一

天津伪政权是日本特务机关一手炮制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七月三十日，天津沦陷。日军侵占天津后，当务之急是维持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安定民心”，“巩固占领地”，为日军扩大侵略战争提供稳固的后方基地。为此，八月一日，天津伪政权——天津治安维持会，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卵翼下正式成立了。天津伪政权的出笼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聚集在天津日租界的特务机关早有预谋，并经过精心策划而炮制的。

天津日租界，自一八九八年日本强行设立以来，一直是日本进行侵华活动的场所，也是日本侵略华北地区的重要据点，随着日军侵入华北，日本帝国主义派遣大批日本特务来津，云集在天津日租界内，按系统组成各种特务组织，并分别负责不同的任务。这些特务系统，配合天津日军的军事行动，疯狂地进行特务活动。譬如，日本大迫通贞中佐为首的“青木公馆”特务系统，其主要任务是策划冀东“独立”，以及笼络北洋军阀直系头目吴佩孚等，

组织华北伪政权；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柴山兼四郎领导的“斋藤洋行”特务系统，它们专门拉拢由东北来津的军政人物；由日本驻屯军参谋三野友吉负责的“三野公馆”特务系统，主要指挥“便衣队”暴乱和监视控制逊帝溥仪的行动；而茂川秀和少佐建立的“茂川公馆”特务系统，它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占领天津，并建立平津伪政权。此外，还有“和知公馆”、“松井公馆”等特务系统，均负有不同的任务。天津日租界的这些日本特务机关，初期由日本关东军指挥，随着日军侵华矛头转向华北，以后归天津日本驻屯军领导。

“七七”事变后，“茂川公馆”的日本特务活动，十分猖獗，在日本驻屯军的支持和授意下，特务头子茂川秀和亲自出马，四处奔走，为尽早成立天津伪政权而精心谋划。经过频繁活动后，七月二十五日，茂川秀和在汉奸方若家中召开了关于成立天津伪政权的预备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高凌霨、钮传善、刘玉书、沈同午、孙润宇等十余人。随即在七月二十七日，茂川在其公馆召见高凌霨，详细研究了有关成立天津治安维持会的具体事宜。经过茂川周密的部署，并征得天津日本驻屯军特务机关的同意后，于七月二十八日，最后确定了天津治安维持会组成人选：有高凌霨、钮传善、刘玉书、沈同午、孙润宇、王竹林、赵聘卿、王晓岩、邱玉堂、方若等十人为委员。就在日军侵占天津的第二天（即七月三十一日）茂川宣布了天津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决定：高凌霨任天津治安维持会委员长，刘绍珪任秘书长，孙润宇任总务局长，张志激任财政局长，钮传善任社会局长，沈同午任教育局局长，刘玉书任警察局长，侯毓汶任卫生局长，王竹林任盐务管理局长，吴季光任商品检验局长，方若任法院院长。八月一日，在天津日本驻屯军、日军陆军特务机关的监督和主持下，天津市伪治安维持会——傀儡政权正式成立。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日本需要一个稳固

而供其掠夺的后方，为此，日军急需建立和控制华北占领区的省、市、县的各级伪政权，而挑选各级伪政权的首脑人物，又是操纵伪政权的关键。因此，于八月十二日，日本陆军省制定的《华北政务指导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把作战的后方（按：即日军占领区）变为日、满、华亲善的基础”。①为贯彻《纲要》的精神，八月二十四日，日军参谋本部将天津中国驻屯军改编为华北方面军，派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官。寺内到津就职后，又在华北方面军参谋部之外，另设特务部，任命喜多诚一少将为特务部长，专门从事指挥伪政权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本内阁会议发布了《中国事变处理大纲》，其中对成立华北伪政权，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一），该政权的首脑应网罗在全中国具有威望的人才；（二）该政权应有适应新时代的机构；（三），应有能号召全国的主张和纲领；（四），我方对该政权的指导，应停止大纲有关日人顾问的幕后指导，而改为配备日系官吏。”②并要求在华北建立省、市、县各级地方政权，亦按此精神办理。而天津伪政权和华北伪政权都是遵照上述的要求和模式，组建而成的。

喜多诚一为贯彻上述“处理大纲”和训令，于九月二十三日在天津成立了“平津治安维持联合会”，统一领导平津伪政权。与此同时，喜多还为建立华北伪政权，积极物色汉奸人选，除根据“处理大纲”的规定外，他还提出两条具体标准：（1）素无抗日言行，又非二十九军出身者；（2）有相当资望而反抗国民党者。③

天津的伪政权视日本特务机关为“太上皇”，伪政权的一切事

①《中国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36页

②《华北治安战》（上）第56页

③张炳如：《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文史资料选辑》第39期

务，均听命于特务机关长的指挥和操纵，对历届天津伪市长的人选和任用，表现尤为突出。日伪统治天津八年，共更换了六任市长，即：高凌霨（1937年8月——1938年1月）、潘毓桂（1938年1月——1939年3月）、温世珍（1939年3月——1943年3月）、王绪高（1943年3月——1943年10月）张仁蠡（1943年10月——1945年3月）、周迪平（1945年3月——1945年8月）。这些汉奸的登台，都是日本特务机关，遵照日本陆军省和日本内阁提出的要求，经过多方考察，认真挑选才被任命为天津市伪市长的。

我们先看高凌霨是如何被日军特务机关选中的。当时密集在天津的军阀、政客、官僚、亲日派争当汉奸走狗的不乏其人，唯独高凌霨当上了治安维持会委员长，这是由于高凌霨最符合特务机关的人选条件。高凌霨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就历任财务、交通、内务、农商总长，又在曹錕贿选中，任临时摄政大总统，后任国务总理。“九一八”事变后，高凌霨丧失民族气节，积极帮助日本人进行侵华的特务活动。一九三五年日军导演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让高凌霨当上了委员。高又是天津人，熟悉当地情况，是亲日派的要员，但又不象曹汝霖那样，是臭名昭著的卖国贼。高既能维持当时治安，又对人民具有很大欺骗性，是日本特务机关较满意的人物——具有一定“资望”和统治“经验”，所以，在成立伪政权时，尽管齐燮元、钮传善同高凌霨为争夺委员长职位斗争很激烈，但日本特务机关长长岭，还是选中高凌霨这条忠实走狗。

其次，汉奸温世珍，统治天津时间最长，手段最毒辣、最残酷。温是天津宜兴埠人，出身名门大族，善于政治投机。曾在北洋大臣李鸿章手下当小幕僚兼翻译。“九一八”事变前后，投靠日本，参加过日本特务策划的天津“便衣队暴乱”，以后逃到大连，投靠了土肥原贤二、柴山兼四郎、板垣征四郎、浅海喜久雄、谷荻那华雄等日本特务，充当了日本间谍。经常来往于大连、天津、北平之间，为日本搜集情报。天津市伪政权成立后，他任天津海

关监督兼河北省银行监事。他为了讨好日本，竟然修改了“关税条例”，把日本向中国输出的七十余种物资的进口税，大部分减免或压低税率，为日货向华北沦陷区大量倾销，大开方便之门。不仅如此，为向日本表示忠诚，经常向日军汇报为日军效劳的“功绩”，并为日本巩固占领区“献计献策”，其卖国求荣，甘当汉奸走狗的行径，终于博得了日本主子的青睐，虽然温世珍的政治资望并不高，但他对“皇军有赤诚之心”这一点，被日本特务机关所选中。另外，由于当时政治和军事形势的需要，也是起用温世珍的重要因素。日军侵占武汉后，在侵华的战略上，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而集中主要力量巩固占领区。日军为了加紧对天津的殖民统治，特务机关让温世珍这样的汉奸出任天津市长，是符合日军侵华战略的需要的。因此，加强对天津伪政权的控制，不仅可以巩固天津地区这个军事战略要地，而且对稳定日军华北占领区亦有重要的作用。其他几届伪市长，也因具备对“皇军赤心效力”，深得日军赏识而被重用的。

此外，天津伪政权历届市长的去留，日本的特务机关起着决定的作用。所以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历届特务机关长的情况。天津治安维持会成立后，日本特务机关长由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代理参谋长长岭中佐兼任。一九三七年九月，日军长野大佐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一九三七年十月，又由日军大本少佐代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天津特别市公署成立，日军仪俄诚也大佐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一九三八年三月，森冈皋少将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一九三八年六月，原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一九三九年初，浅海喜久雄大佐继任，一九四〇年冬，曾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雨宫巽殿少将接任，一九四三年初，日军山下中佐接任，一九四四秋，松井大佐任天津特务机关长，直至日本投降。

温世珍能够上台，并统治天津达四年之久，除上述条件外，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的后台多、根子硬。日本外务省的松冈洋右曾为温世珍的上台向日本内阁“美言”，板垣征四郎、日本华北派遣司令官多田骏、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以及驻津日军司令官本间雅晴都是温世珍上台推荐者和支持者。温在大连期间，进行间谍活动的“上司”柴山和浅海，又是他在职时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是温可靠的后台。同时，他又与雨宫巽殿关系甚为密切，雨宫后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就更加重用和支持温世珍。因此，温才能长期保住伪市长的“宝座”。一九四三年雨宫调走后，温世珍也立即下台。其他各届的伪市长去留，也都是由日军特务机关长裁决的。

二

日本对天津伪政权组织机构严加控制，通过派遣日人顾问和顾问辅佐官进行“内部指导”和监督。天津伪政权的统治机构和组织系统，是根据日本政府提出的“应有适应新时代的机构”的要求组建的。这套机构从名称上看，可分为治安维持会、天津特别市公署、天津市政府三个阶段，其组织系统，则基本上大同小异。

天津治安维持会时期，（1937年8月1日—1937年12月）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为秘书处，下属机构有：总务局、社会局、财政局、公安局、教育局、工务局、卫生局、盐务管理局、电报局、电话局、北运河河务管理局、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商品检验局、物资调整委员会、金融调整委员会、电政监理处等，以及市内各区和特别区。

天津特别市公署时期（1937年12月17日—1943年11月），汉奸潘毓桂任天津市长（1938年1月18日），为适应日军侵华，加强控制天津伪政权的需要，立即秉承主子的旨意，在治安维持会的基础上，对市公署的组织机构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市公署的

办事机构设，总务厅（1638年5月，撤消总务厅，改设秘书处），还在市公署特设顾问室、参事室、视察室、参议员、谘议员等机构。顾问室是日本特务机关专门对市公署进行控制的办事机构，特务机关长议俄诚也派日人臼井忠三任市公署高级顾问，①对市公署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市公署的下属机构，除原治安维持会的各局和市管各单位外，又新增设了公用、外事两处，均由市公署直接管辖。而外事处（兰振德任处长）名义上办理涉外事宜，实际上是协同日本各方特务进行联络工作，为日军统治天津市服务的办事机构。这期间还将公安局改为警察局（周思靖任局长），目的在于扩大警察局权力，增强其维持治安的职能。同时，又把海上警察局、水上警察局，统归市公署直接掌握和控制（海上、水上警察局原为警察局的分局）。还将内河航运局、特别一、二、三区公署、地方辅治会（原归社会局统辖），通通改归市公署直接领导。这些变动和调整，都是为了加强对天津人民的统治，镇压天津人民的抗日斗争。

温士珍上台（1939年3月）后，对日本唯命是从，秉承主子意旨，为控制天津局势，加强对天津人民的殖民统治，首先扩大了市公署的办事机构秘书处，陈啸戡任秘书长。除扩充了原有的秘书处各科室外，又将外事处改为外事室，由秘书处管辖，还有

①臼井忠三是天津伪政权的第一任日本顾问。日本强占日租界时，臼井就来到天津，后久居天津日租界，是有名的“中国通”，老牌的日本特务。在日租界长期任日侨“居民留团”团长。“七七”事变后，他曾组织“居民留团”、“日本义勇队”和“别动队”，与日本警察署、日本宪兵队，积极配合日本侵华军，参加攻占天津的战役，因此，他受到日本军部和外务大臣的特殊奖赏。第二任市府顾问为丸茂藤平，第三任市府日本顾问为高野勇。

视察室和技术室亦归秘书处领导。市公署的下属机构，除原有的各局和市管单位外，为了加强统治，特设了警察教练所（后改为警察学校），由警察局长郑遐济兼任所长，专门从事训练警察，扩大警察队伍，培养打手工作，以此来维持天津的社会治安，加紧镇压天津人民的抗日斗争。此外，温还委派兰振德任社会局局长，积极推行保甲制度，以控制监视群众的行动。一九四〇年郑遐济把新闻管理所划归警察局管辖，“检查新闻，纠正思想”以控制舆论。不仅如此，一九四一年底，温士珍为配合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在市公署特设宣传处，由市公署秘书长陈啸戡任处长，专门控制和掌握宣传舆论工作。大力鼓吹“亲日反共”的言论，一九四二年一月，宣传处创办，由日本顾问专员中原李孝治、冈一太直接控制的《津津月刊》，发表了大量的“亲日反共”的言论和报导，为日本侵华大造反动舆论。

天津特别市政府时期（1943年11月5日到1945年8月）伪市长张仁蠡按日本主子命令除了控制经济、实行经济封锁外，又增设了经济局，其他市府机构变化不大，直到日本投降。

日本特务机关对天津伪政权组织机构的控制，主要是派遣日本顾问，到各级机关进行监督。天津维持会时期，日本特务机关长直接掌握和控制委员会的一切大权。天津特别市公署时期，开始设置了顾问室，由特务机关派顾问或顾问辅佐官到市公署办公。市公署下属各区（包括特别区）、局、处、科，均按日人的职位高低分派到各部门工作，其主要任务是监督和保证日军政策的贯彻执行。特务机关对派遣人员，有严格的要求和制度，对未能完成任务或完成不好的人员要加以制裁，并要求他们定期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日本特务机关认为特别重要的机关和单位，则派现役军人当顾问，以加强其控制。如：警察局，则派天津日本宪兵队长任顾问，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则派日本驻天津军队中的法官当顾问，商品检验局由日本驻军中的军需官任顾问。又如执掌輿

论大权的宣传处、新闻检查所，都由日人直接控制，掌握天津经济命脉的经济局、社会局，均由得力的日人当顾问，掌握实权。日本特务机关委派的各级顾问，共同的特点是：一、大部分都懂业务（多数人在“满州国”工作过），二、多数是“中国通”，他们不仅华语说的流利，而并对中国的社会情况、地方特点、风俗人情等都相当了解。因此，日军对伪政权组织机构的控制就更加得力，而对天津人民的殖民统治就更加残酷。

此外，日本特务机关还利用他控制下的“群众团体”进行奴化统治，如新民会、妇女会、青少年团、新闻协会、佛教协会、职工会、工商界的“公会”，以及名目繁多的“慈善团体”等等。这些组织，都是日本特务机关进行镇压和统治天津人民，以及进行毒化思想和奴化教育的工具。

三

日本特务机关对天津伪政权的施政方针和各项政策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参加市政会议和制订政策大纲及下达指令等方式进行的。天津伪政权的市政会议，是决定天津市大政方针的决策机构，召开这个会议，必须有日本特务机关长或市府顾问、或顾问辅佐官参加。会议一般由伪市长主持，有秘书长、参事、各局、处长参加，与会议主题有关的秘书、科长得予列席会议。会议内容，除研究和传达贯彻华北伪政权的方针、政策、指示、训令外，主要是研究决定天津市的重大政策问题。如：任免市政府重要人员、调整新设机构、开展各种重大政治运动（如治安强化运动，“献金”、“献铜”、“献铁”运动，“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以及宣传“大东亚共荣”运动等等）、推行各种政策、实行经济管制、经济封锁、粮食配给制度、“米谷统制”，以及有关治安和舆论宣传等各方面的重大问题。所有重大政策的推行和贯彻，均由日本特务机关长最后定夺，然后具体实施。

我们仅以日伪在津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为例，看日本特务机关通过指令，如何控制天津伪政权的。

日本帝国主义为确保华北“兵站基地”，加强控制和操纵华北伪政权，自一九四一年三月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以“反共”、“灭共”为主要目标，在华北沦陷区，对军、政、会各机关及全体民众，进行总动员，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和特务部指导，华北政务委员会具体贯彻执行，即“由日方在幕后暗中极力指挥”，“以政务委员长为首的中国各界要人，率先活动于第一线”，开展这一运动。^①每次“治安强化运动”，均由华北方面军制定《实施计划》，提出具体实施方针和实施要领，再由华北政务委员会作出具体计划，提出要求、训令，分发各省、特别市执行。天津市不仅执行华北伪政权的训令，还要依照天津特务机关的指示和计划去贯彻执行。譬如：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日，天津日本特务机关制定的《天津特别市地区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计划》中对天津市推行这次运动，作了十分详细的布署。《计划》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就是“将天津特别市中日军、官、民之总力向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三大目标彻底集中，展开强力之思想战，并切实实行的运动，以求大东亚战争之完遂，而期治安之飞跃强化。”在实施要领中，特别强调这次运动必须由“天津陆军特务机关长统制指导，监督本地域之运动全盘”。在津日人由“天津特别市市长及天津新民会长之一元化的统制指导监督举行之。”各国策会社、群众团体均由特务机关指导。在宣传上，强调多种形式，多种方法，“应投合宣传对象之心理”，用新闻报导、报纸、杂志、电影、戏剧、讲演、照片、幻灯、传单、包装纸、标语等。还规定各机关要定期向特务机关报告执行情况。同

①《华北治安战》（上）第376页

时天津伪政权还指令下属各部门，按上述要求，再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为此天津市公署制订了《天津特别市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剿共实施办法》，规定了在市内“防共剿共”的具体内容和措施。如建立城市灭共网，对工厂、学校、商店及公共场所进行严密监视和控制，在市县交界处设立检查口，盘查来往行人，出动巡回检查队，维持治安，取缔和查封进步书刊和书店，监视和跟踪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召开各种会议，组织全市灭共大游行，利用保甲进行户口大清查等等。

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市伪政权的控制，虽然不像伪满州国政权那样，由伪官吏公开参加政府来实现的；但是，从天津市伪政权的建立、伪政权组织机构设立、伪政权首脑人物的选定、以及伪政权施政方针和具体政策的制定，都是由日本特务机关一手炮制和操纵的。所以，天津市的伪政权同沦陷区各地伪政权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傀儡政权。

略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张洪祥 高德福 李成民

一九三五年底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宣布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傀儡政权。从它产生，到一九三八年初同伪华北临时政府合流，都是由日本特务机关一手导演的。冀东伪政权的出现，为日本侵略华北和全面进攻中国，提供了有利条件，给中华民族、尤其是冀东人民带来沉重灾难。

—

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我国东北后，又立即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

当年华北包括冀、察、绥、晋、鲁五省和平津两市地区，在我国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这一地区的丰富物产资源和广阔市场，早已为日寇所垂涎。当年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曾大言不讳地说：“满州市场已臻饱和，短期内亦难再行扩大，即不能与帝国生产率之增进相调和。”“华北……在我帝国计划的指导与经营下，则原料与生产量能增加三倍，民众之消费能力亦自能大为增进。故华北，诚为帝国之最好殖民地。”^①因此，一九三三年初，日本关东军以四个师团兵力加上伪军共十万人，发动了对华北的侵略战争。一月三日日军占领了山海关，二月底至三月初又武装占领热河省。接着，日军越过长城，侵入河北省冀东地

^①《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第46页。

区。在民族危亡关头，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使战场一败涂地。同年五月日军已先后占领密云、通县、唐山、宁河等地，进一步威胁平津。国民党政府为了苟安，竟然放弃抵抗，请求停战，并于五月三十一日同日本关东军签订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是一个屈辱的卖国协定。其内容是日本关东军事先拟好的。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政府不仅默认了日本侵占东北、热河的合法化，而且使日本获得了长城以南地区的支配地位，长城各口脱离了中国的管辖，平津以东的冀东地区成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在这一地区驻扎。这样，不但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与华北连接的咽喉地带置下了有力的据点，使华北门户洞开，随时可占冀察，夺取平津；而且也为后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塘沽协定》签订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策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此以前，日本对东北、热河等地的侵略都是武装军事占领；而在此以后对华北的侵略，则变成了以“政治谋略”为主，即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借以分裂中国，侵吞华北。这时候日本侵华策略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第一，日本同英、美、苏之间矛盾的加剧。自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其政界、财界、军部都有一种“焦躁感、孤立感。”^①特别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间，日本与英美的关系有恶化的趋势。如一九三三年四月，“日印商约”取消，六月东非英属增高日货入口税，一九三五年英国施行日货倾销税等；美国海军也在扩造军舰。当时中国华北为英美势力范围，如果日本武装占领华北，进一步损害英美在华利益，必加深

①《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五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22页。（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

同英美的矛盾。而苏联感到日本关东军的威胁，自一九三二年春开始，在东部边境大量增兵，并构筑了坚固的国防工事。因此日本关东军“痛感对苏联国防的危险”，急需在伪满边境部署兵力，无奈兵力不足，对华北只能依靠“政治谋略”。

第二，日伪在东北统治不稳固。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到一九三五年初，在北满、东满和南满等地先后建立了七支抗日联军，人数达五万人之多。英勇的东北抗日军民，在广阔的东北大地上，到处袭击敌人，动摇着日伪的统治，大大牵制了关东军的兵力。

第三，日本的战争物资准备不足。到一九三三年，日本仅有十二家飞机厂，年产飞机发动机二千台左右，而陆军中的飞机不足一千架。汽车年产仅二千二百余辆，大量军用汽车还需进口。坦克年产三百八千辆，钢产量约三百万吨左右。显然，这些战略物资，还不足以应付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需要。而且这时候一些极端法西斯分子还未能完全控制日本上层政权，政界和军界在侵华策略上也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些都需要时间去进行调整。

第四，受到李顿“国联调查报告书”的影响。1932年李顿调查团关于中国东北问题的报告书中曾建议：在东北地区建立国际共管、由日本获得实益的自治政权，以适应东三省的“特殊环境”。这时日本军部认为，塘沽协定以后，河北省三分之一的县份已造成“特殊形势”，这种“特殊形势”也可适用于整个华北；而列强各国和中国政府既已赞同东北自治于前，则不能反对华北自治于后。

日本侵华策略的这一变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的“帝国外交政策”中体现了出来。十一月三十日，陆军省对上述“帝国外交政策”的最后修正案中明确提出要“支持中国大陆之分治活动，驱逐国民党势力于华北之外”。①

①张蓬舟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224页。